



大 会

Distr.
GENERAL

A/CONF.157/PC/63/Add.28
4 May 199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世界人权会议
筹备委员会
第四届会议
1993年4月19至30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5

世界会议的出版物、研究报告和文件的准备情况

1993年4月29日新加坡共和国常驻代表致
世界人权会议协调员的信

谨请把随信附上的新加坡共和国外交部副秘书基·马赫布班尼先生1993年1月28至30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亚洲和美国观点”会议上的发言经编辑后的全文作为世界人权会议筹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文件分发。

请注意该发言是马赫布班尼先生以个人身分发表的讲话,并不反映新加坡政府的观点。

大 使
克·凯萨瓦帕尼(签名)

对人权和新闻自由的一个亚洲观点

导 言

1. 我想先作一个比喻,但对那些已经听过我这个比方的各位要表示歉意。从许多第三世界公民的角度来看,人权运动往往具有一种不寻常的性质。许多人认为它多少有些象这样的情况:他们就如置身于一条漏水、拥挤不堪的船上饥饿和身患疾病的乘客,而这条船将陷入凶多吉少的漩涡激流中,而险恶的急流将吞噬其中许多人的生命。掌管这条船的,往往则是一位严厉苛刻,时而公正,时而有失公正的船长。河流两岸站立着一大群富裕、无忧无虑、怀有良好意愿的旁观者。一旦这些旁观者看到乘客们遭到鞭笞或监禁或甚至被剥夺言论的权利,他们就登船干预,制止船长迫害乘客。但这些乘客却仍然饱受饥饿和疾病之苦。一旦他们试图游向两岸投入那些仗义者的怀抱时,却被断然驱回这条船,继续承受其终日无望的苦难。这并不是抽象的比喻。这正是海地人实实在在的切身体会。

2. 这只不过是冷战结束之时盛气凌人的西方推行人权的许多怪异现象之一。其它还有更多的怪现象。然而,当我在哈佛大学研讨会上对普遍实施民主、人权或新闻自由提出质疑时,我发现这些价值观念实际上已经成为“容不得批评的观念”。任何人都不得对其内在价值提出质疑。更有甚者,当我坚持提出疑问时,我遭到人们的窃笑、冷漠的眼光和普遍的嘲笑。一般人认为,任何亚洲人,特别是新加坡人,对这些观念提出质疑,只是为其政府辩说而已。

3. 我如今与当初一样确信,在冷战结束后西方向第三世界大力推行民主、人权和新闻自由,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一大错误。这种运动不可能有利于生活在发达世界之外的43亿人民,甚至也不可能有利于生活在其中的7亿人民。这项运动只可能恶化而不是缓解世界大部分人口生活的困难条件。

4. 但为了把这一核心要点注入西方人的脑中,人们必须首先扫除一些障碍,因为这些障碍使得这些专题成为西方人论述中不可触动的神圣观念。当西方人在与非西方人讨论这些专题时,西方人必须首先承认不论他是有意或无意,他总是持着一种站在讲坛上的态度。在21世纪前夕,欧洲人对待亚洲人的这种态度必须结束。这种自以为道德上高人一等的意识必须予以摈弃。必须建立起无等级差别的辩论条件,才能在亚洲人与西方人之间展开有意义的讨论。

一、平等的辩论场所

5. 为消除笼罩在人权和新闻自由专题上的“神圣不可侵犯”因素,我建议列出在这些专题的讨论中被西方忽视、压制甚至故意认为毫不相关或无关紧要的若干与之相反的观点。如果这些异端观点还有任何价值的话,则我希望能致使西方作者们认识到他们在这些专题所涉的智慧和道德上是无专利的,他们在与非西方人讨论这些专题时应当稍稍谦虚一点。

1. 新闻自由并不一定会导致有秩序的社会

6. 西方的一个主要设想是,良好的社会需要有新闻自由来遏制对权力的滥用。新闻自由可遏制不好的政府。缺乏这种自由,会导致对更大程度的滥权和恶劣的政府。这可能是事实。新闻自由可形成良好的政府。但这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前提。新闻自由也可形成坏政府。

7. 在东南亚,我们已经看到这一不幸情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菲律宾是东南亚享有最大程度和最长时间新闻自由的一个东南亚国家(除马科斯实施军管法出现中断期间以外),但菲律宾也是东盟社会进行现代化和实施经济发展中遇到最大困难的国家,这表明新闻自由并不是实现发展和取得进展的必要条件,也不是仅此就足够的条件。

8. 印度和中国是两个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室,可以裁断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将会有助于社会发展和繁荣。这两个国家之间,它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二,即在全球每5个中间占有2人。各自奉行的是极为不同的政治路线。西方赞赏印度的新闻自由,对中国缺乏自由嗤之以鼻。然而,当今哪一个社会发展的较快,哪一个社会可能首先实行现代化呢?

9. 最近发生的阿约迪亚事件向全球的各社会展示了另一个新的重要层面。印度新闻界力图控制民众情绪上的反应,限制对拆毁清真寺的录象的播放和散发。但是目前,许多印度人的家中还是能看见外国新闻社(通过卫星转播和录像带播放)的录像片段,因为外国新闻社感到没有理由行使社会、政治或道德上的克制。那些热衷于转播电视片段者,本人从来不必承担其后果。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或香港的转播室里,由于他们的电视转播结果而在印度引起的暴乱从未波及其本国。不幸的是,这些从事新闻的人员并没停下来考虑一下,是否如果行使克制,他们能除他们本人之外顾全他人的生命。

2、西方记者受到西方偏见观念和利益的限制：“客观”报道是一大虚伪

10. 有些人说,美国新闻界对越战这一重大事件的报道是美国新闻史上光辉的一章。199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随着美国士兵的遗体从越南运送回国,美国公众的情绪转而反对战争。美国不得不撤出。美国的新闻界协助编造了理由:美国支持虚伪狡诈的西贡和金边政权)“坏蛋”镇压(北越或柬埔寨丛林中勇于奉献革命者)“好人”。一些诸如《湖中之火》为越南革命涂脂抹粉之类的书籍,成为美国记者的圣经。当最后一名美国士兵撤离越南时,大部分美国记者感到心满意足和如愿以偿。

11. 然而,柬埔寨和越南共产党的最终胜利暴露了革命者的真实性质。柬埔寨种族灭绝的史实、成千船民在南中国海丧生都是众所周知的。革命之后,人类苦难的程度并未减轻,反而加剧。然而却没有任何美国记者站出来承认,也许他援引《湖中之火》或者要求放弃西贡和金边政权是错误的。只要美国记者维护了美国至为重要的利益,保全了美国人的生命,美国记者便毫无必要考虑他们的行动对非美国人、越南人或柬埔寨人在道义上的后果。

12. 谈到对天安门事件的报导,这一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新闻事件。西方新闻媒介的主要报导认为,这是中国民主份子反对中国集权主义者的革命。不断地演播复制的自由女神塑像的镜头,向人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生动形象。然而,尽管对天安门进行了大量的报导,但西方宣传媒介却没有报导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一事件的。很少中国的知识份子认为中国已经可以实现民主。大部分人都怕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灾难),他们担心又返回到毛时代的独裁主义。这是一场温和派集权主义者与强硬派集权主义者之间的争斗。西方宣传媒介生动地报导了“强硬派”表面上取得的胜利,但却未向全世界转告随后的现实:温和派集权者主义又重新掌握实权。

13. 在天安门事件期间,若干西方记者公然缺少诚实。他们先与一位进行“绝食”的学生共进午餐,然后再报导他的“绝食”。他们并不是报导这一事件的旁观者;若干人甚至为学生出谋划策。但谁也没有挺身而出承担学生们不得不承担的后果。

14. 把西方记者在1970年代初对中国的报导与1990年初的报导相比较,最能够看出西方记者在报导中国时是如何受到西方利益的影响。1972年当尼克松总统踏上中国领土时,美国新闻界正与当初在文化大革命中刚刚杀害了几百万人的政权实际

打得火热。然而,在1990年代,曾使几百万民众摆脱贫困和受辱并承诺使他们走上振兴之路的相当温和的政权,却被当作受人藐视的政权对待。

3、 西方各国政府与那些实行种族灭绝的当权者勾结

15. 1942年8月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黑暗的时刻。丘吉尔秘密地飞往莫斯科,亲自向斯大林转达一些不幸的消息:盟军尚未准备好,不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斯大林的反应十分气愤。南希·考德威尔·索雷尔在《亚特兰大月刊》(1991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次会见:

“分歧仍然存在,但在最后一天的晚上,当丘吉尔前往辞行时,斯大林有所缓和……。丘吉尔原先预计的时间安排一直推迟到7点。大家自由交谈开怀畅饮,在一个十分罕见的亲密片刻,斯大林承认战争的重压,也比不上为向农民们强迫推行集体农业政策而展开的可怕斗争,几百万富农已经完全被消灭。身为历史学家的丘吉尔想起了伯卡的箴言,‘如果我不能在没有正义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我就不改革’,但是身为政治家的丘吉尔却认为“战争需要团结,最好不要大声地予以道德化”。

16. 这段轶事引起了人们的一阵轻轻地笑声。真是一位老奸巨猾的丘吉尔。为避免仅仅予以道德化而使斯大林难堪,丘吉尔确实很圆猾。但是,当时,甚至今天丘吉尔的声誉并没有由于他与种族灭绝统治者的关系而遭到贬损。现在再看一下在类似情况下不同的人物:撒切尔夫人和波尔布特。从历史上讲,他们可能会面,但他们当然从未见过面。现在我们试图描述一个可能的会面场合并试一试是否能引起一阵轻轻的笑声。不可能?为什么?

17. 深入地想一想,你就会惊奇地发现,思维审慎、消息灵通的人士完全有可能采取双重标准。如果阻止撒切尔夫人与波尔布特之间进行任何可能的会面的规则是,“你不应当与任一种族灭绝执政者进行任何交谈”,那么同样的规则也应制止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任何会晤。正如英国哲学家 R.M. 黑尔曾着重指出的,道德规则本身是可以普遍化的。如果我们确实想让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会晤(直到几个星期之前尚无任何历史学家对丘吉尔加以谴责,这必然是普遍的感情问题),那么必须对这条规则作出修改,“你不应与任一种族灭绝执政者进行任何交谈,除非存在可使罪行减轻的情节”。

18. 这不只是语意上的细微变化。而是我们做出了根本性的飞跃,通过以下故事中所含的比喻我们可更好地理解这一飞跃:一个男人遇到一个女人,他问这个女人

是否愿意为一百万美元的报偿，同他共寝一宿。她答复“一百万美元，当然可以”。然后他又说，“五块美元怎么样”？她非常生气地回答说，“你当我是什么人”？他回答说，“我们已经非常明确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我们只不过是谈判价格而已”。所有这些容忍丘吉尔会晤斯大林但会很容易谴责同波尔布特进行任何会晤的人从逻辑上讲都处于这一女人的地位。。

19. 就斯大林的情况而言，为了英格兰的生死存亡，这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但就波尔布特的情况而言，由于与他的任何会晤不可能想象得到会涉及西方的任何重大利益，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可以容忍的理由。因此，西方全面和坚决地谴责与波尔布特甚至与其红色高棉的追随者进行任何接触。柬埔寨人民的悲剧就在于西方采用这样绝对的道德规则，只是因为其中未涉及到西方本身的关键性利益，因此西方也从未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他们象丘吉尔对斯大林那样，也以灵活的方式对待红色高棉，柬埔寨人所承受的痛苦是否也会减轻一些呢。

20. 在整个1980年代，若干亚洲国家政府一起试图实现切实可行的柬埔寨和平解决（这种解决不可避免地必须把红色高棉包括在内），但它们却因与红色高棉直接接触，而遭到奚落和抨击。美国外交官被指示绝不准与红色高棉代表握手。

21. 在过去的12个月，（美国新闻界全面认为）拉多范·卡拉季奇和他的塞尔维亚族追随者们所犯下的残酷暴行，完全有充分理由把他们列入与波尔布特伊迪·阿明同样的恶棍行列。然而，西方外交官却毫不犹豫地同这些塞尔维亚族的代表握手。这是否是对西方人实行一种标准，而对亚洲人又有另一种标准呢？

4. 一旦符合西方的利益，西方各国政府将会毫不犹豫地牺牲第三世界社会的人权

22. 目前的缅甸政府推翻了1990年民主选举的结果，并残酷地镇压随后引起的群众抗议游行。缅甸遭到西方制裁的惩罚。亚洲各国政府却因未能积极地采取同样的制裁行动而遭到抨击。

23. 阿尔及利亚的当前政权推翻了1992年民主选举的成果，并残酷地镇压了随后爆发的群众抗议游行。阿尔及利亚却未遭到西方制裁行动的惩罚。但为何采取如此明显的双重标准，对亚洲各国政府却从未给予解释。

24. 但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出于担心西方制裁会导致更大程度的政治动乱，迫使千百名船民渡过狭窄的地中海涌入欧洲，为此使得欧洲共同体各国政府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处事。尽管如此，西方各国却毫不犹豫地抨击亚洲各国政府出于上述同样原因的考虑而在对缅甸或中国实行制裁时采取同样的谨慎态度。按照任何道德标

准,双重标准显然是不道德的。有多少西方的报刊着重地指出了这一点?

5. 西方利用侵犯人权行为为借口而抛弃那些已不再为西方利益服务的第三世界盟国

25. 在冷战期间以及象今天一样,西亚德·巴雷(索马里)、蒙博托(扎伊尔)和阿拉普·莫伊(肯尼亚)的罪恶行径一直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并不是在冷战结束的那一天,从好人变为恶棍的。然而,在冷战期间被认为值得西方支持的行为,却在冷战结束之后,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26. 西方各国政府、宣传媒介和公共大众显然深为满意的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它们终于能够推行“道德的”政策。然而,既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承认,(从逻辑上讲)西方在冷战期间推行的是“不道德的”政策,也没有人提出利用和抛弃盟友是否是“光明正大”的问题。

6. 西方不肯承认推行“道德的”人权政策会产生不道德的后果

27. 1989年8月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结束时,当时的越南外交部长阮基石,坚持会议宣言应呼吁禁止红色高棉的种族灭绝政策和行为东山再起。当时所有出席者都清楚,阮基石真正关注的并不是布尔布特的记录。(确实,阮当初犯了一个错误,他私下向国会议员斯蒂芬·索拉兹承认,越南入侵柬埔寨并不是为了从布尔布特手中拯救柬埔寨人民,尽管越南官方是这么宣传的。)但是,阮知道,红色高棉作为巴黎会议的与会方是不会接受这一提法的。因此,会议将毫无成果,这种一事无成的结果正是越南人所希望的,因为当时越南人还未准备放弃对柬埔寨的控制。西方官员并不敢对阮提出疑异,因为担心阮基石将在西方的新闻界揭露他们。与此同时,尽管使得可能导致柬埔寨和平的会议遭到挫败,阮基石却在西方新闻界的眼中呈现出良好的形象,因为他强烈地反对红色高棉。然而,从柬埔寨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西方强烈反对红色高棉的协商一致立场,反而有损于柬埔寨人,因为这阻止了西方代表揭露阮基石公然挫败和平会议的行径。好事(西方新闻界对布尔布特的谴责)却变成坏事(和平会议遭到破坏)。

28. 西方代表本应具备道德上的勇气,在和平会议上站起来面对西方宣传媒介,阐明如果大家希望达成一项结束柬埔寨人民苦难的和平协议,则必须使红色高棉加入会谈。反对红色高棉的情绪是如此强烈,甚至没有一位西方领导人曾想过这么

做。这就对道德哲学者产生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矛盾问题：显然在道德上正确的立场（即，排除红色高棉）却产生了不道德的后果，延长了柬埔寨人的痛苦。

29. 不幸的是，没有一位在世的西方政治家有勇气发表这样的见解，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讲求政治上正确”的时代，西方媒介会对任何这样的勇士进行无情的抨击。为了道德上的正确，却产生了道德上的懦夫。

7. 犯有某些侵犯人权行为的不完善政府胜过在许多没有政府的社会

30. 自冷战结束以来，至少有两个国家出现分裂，索马里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冷战期间都有利于西方。当时这两个国家政府的恶劣行径得到宽恕。当这两个统治政权（各以不同的方式）被抛弃之后，其直接的后果是加剧了人类的苦难。实利主义者的道德哲学家会毫无困难地争辩说，原先的政府虽不完美，因它造成痛苦较低却是一个较佳的道德选择。

31. 西方之无法接受这一点可导致南斯拉夫和索马里所经历情况的重演。以秘鲁为例，该国正逐步滑向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藤盛总统实施紧急状态条例以扼制这种趋势。他应该得到称颂，因他有勇气采取决定性行动阻止无政府状态。但由于他采取的行动形式，暂时从议会统治向后有所倒退，而被西方认为是不可接受的，然而，西方却忽视了由于其行动使得秘鲁人民得到的良性结果。为了维护思想意识上纯洁的形式，西方却准备牺牲秘鲁人民的利益。

32. 如果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就实施目前西方惩治独裁主义政府的政策，西方要求以独裁程度较低的政权取代当时执政的政府，那么台湾和南朝鲜的惊人经济增长从最开始就会被扼杀。但是，西方反而允许这两个全心致力于经济发展的独裁主义政府充分自然发展，实现了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从而为台湾和南朝鲜成为较为开放和积极参与的社会铺平了道路。从东亚取得的教训是很清楚的。没有捷径可走。发展中社会必须首先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成功，然后才能实现发达国家社会的社会和政治自由。

二、亚洲对人权和新闻自由的观点：与西方对话的原则

33. 亚洲对人权和新闻自由没有统一的看法。人权和新闻自由是西方人的观念。亚洲人不得不对之作出反应。可以预料到的是，从完全赞成这些观念的人到统统拒绝这些观念的人都有。由于许多亚洲人感到不得不对这些观念在口头上表示赞

赏,使对亚洲人的反应模糊不清。例如,许多日本知识份子仍保留了其幼年时期的明治复兴思想,认为日本应进一步的西方化而不是亚洲化,因而声称他们坚决赞同西方的人权价值观念,但同二次大战中日本的记录相提并论时,却又奇怪地无能为力。仅举两个城市为例,从新德里到马尼拉,有许多人强烈和真诚地相信这些价值观念。但是在大部分亚洲社会中,很少人意识到更谈不上理解这些观念。关键是,亚洲广阔的大陆正忙于应付迫在眉睫的挑战,既无时间也无劲力一板一眼地讨论这些问题。

34. 因此,我虽不自命地为亚洲辩护,但我可相信,大部分亚洲人不会把我的观点当作奇谈怪论。我今天的希望是,找出某种可取的中间立场,使亚洲人和西方人能够在平等的地位上本着同等合理的观点展开对话。因此,我冒昧地提出指导这一讨论的五条原则。

1. 互相尊重

35. 我想强调的第一条原则是,在亚洲人和西方人之间就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展开的所有讨论都应以互相尊重为基础。我曾访问过四家美国的大报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如果在晚上你走出这四家报社的任何一家报社办公大楼,离开主要大街约几百米,你就会有生命危险。然而,尽管如此,没有一个编辑部,或报刊编辑会主张削减惯犯的公民自由。习惯性犯罪造成的危险已被认为是换取不削减自由程度可接受的代价。这是一种社会选择。

36. 在新加坡,你可在夜里从《海峡时报》社出发向任何一个方向游逛,都不会使你的生命遭到危害。原因之一是,那些惯犯和吸毒成瘾者都被看守起来了,往往对他们实行长时间的看守,直至他们彻底的悔过自新。虽有保障措施确保无辜的个人不受扣押,保障大多数人享有城市街道安全的利益优先于对严格的合法程序的考虑。这是另一种社会选择。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一种选择本身固有优越性。让那些做出选择的的人承受他们的选择产生的后果。同样,如果西方对此观点不持惯常的轻蔑窃笑态度,那么让我再说一句,一个禁止出售口香糖的城市,与一个实际允许在城市街头兜售强效可卡因的城市一样,都有同等的道德权利容许或不容许这么做。让我们大家尽力回避不加思索地进行自以为是的反驳,认为某一种选择比另一种选择更为道德。

37. 我并不想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但是对于西方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的是,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选择也应得到同等尊重这一提法。五百年来,西方一直是这种或另

一种形式的统治者。二次大战之后，大部分亚洲，犹如大部分第三世界，已经获得政治上的解放。但是被殖民者的和殖民主义者两方面在思想上的解放过程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解释为何在香港回归中国前五年，彭定康进驻香港，并提出中国完全不能接受的一种政府形式。如果中国的总督来到北爱尔兰，并为北爱尔兰摆脱联合王国确定条件，英国将大为震惊。但是英国人并不认为他们在香港的所作所为有任何不当之处。英国人与许多西方人一样，认为他们有权利对亚洲人指手划脚。

38. 随着东亚越来越富裕，最终将会以平等的地位展开这种讨论。但是象我们这样的论坛，可以通过设法建立起大家以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论述的形式以实现这样的平等交流。

2. 经济发展

39. 第二，主张人权的西方人的根本关注是，消除骇人听闻的侵权行为，改善生活在发达世界之外的43亿人民的生活条件。不妨指出，目前西方人的运动(即便大力开展，但未必可能做到)对43亿人民的生活产生的影响将是微乎其微的，尽管有可能会出现象阿基诺革命和向昂山、姬颁发诺贝尔和平奖那样的象征性胜利。

40. 只有一种力量才具备“解放”第三世界的实力。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有翻天覆地实力的力量。它冲破旧的社会安排，并为整个社会在更大百分比程度上参与社会和政治决策铺平道路。中国共产党已不再能掌握毛泽东时代享有的严厉的极权控制。邓小平的改革已经扫除了这种可能性。如果西方打算永远埋葬毛泽东的极权统治秩序，就应全力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即便他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控制而偶尔不得不诉诸于镇压行动。基本的趋势是明确的。因此，天安门事件3年半之后，为在北京掌权的是“温和”派而不是“强硬”派极权主义者，这并不令人惊奇。

41. 不幸的是，(与促进民主和人权不同)促进经济发展是艰难的。这对发达社会而言，得付出直接和间接的大量代价。对于第三世界来说(促进经济发展)可能是件好事，但在短期内对西方各国社会可能是痛苦的。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将不得不抛弃他们的大规模的农业补贴。然而，不幸(甚至令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西方民主社会(阻止政治家们谈论牺牲)的本性，完全可能成为在第三世界包括在亚洲有效地推广民主和人权的最大障碍之一。

3. 与各国现政府共同努力

42. 第三，根本不要幻想推翻亚洲各国的现政府。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曾经出席了哈佛大学严厉抨击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讨论会。这是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组织的一个论坛，讨论1991年11月不幸在帝力发生的杀戮事件。两位当时事件直接在场的美国记者出席了会议，会上提供了第一手的活材料并且在几位反对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左派抨击者的协助煽动下，在整个会场掀起了群情激愤的情绪。这使得一位倒霉的国务院官员不得不出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应继续与苏哈托政府交往。如果当时在会议厅的这些人们有权推翻印度尼西亚政府，他们当场就会这么做了，丝毫不会考虑随后可能会产生的可怕后果。这就是许多人权活动者的态度：推翻我们认为不理想的政府，不必顾忌随后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人权活动家本身也许不会造成什么麻烦。但是一旦他们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造成实际损害的能力便可能成倍地增长。

43. 我呼吁西方在同亚洲打交道时应具有长远的目光。这些都是已经具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历史的社会，不可能一夜之间产生变化，即便方励之当选为中国总统，社会也不会一下子改变。阿基诺总统的经历，已经为那些认为只要更换最高领导人即可改变一切的人们提供了活生生的教训。

44. 在目前发展阶段亚洲所需要的是，一心致力于迅速发展经济的政府。有幸的是，从中国和越南那样共产主义社会，到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军方统治的社会，直至大韩民国、台湾和马来西亚的民主社会这一系列政治理念不一的社会中，这样的政府为数并不少。它们都在经历迅速的经济增长。它们应当予以奖励和鼓励（哪怕只是作为其他社会的样板）。对于偶尔发生的政治镇压事件应予以批判，但是只要各国的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便不应对这些政府进行惩罚。只有那些诸如使它们的人民陷入几十年经济停滞的北朝鲜和缅甸之类的社会才应受到这样的非难。

4. 制定最低限度的文明行为守则

45. 对一西方的人权活动者来说，建议他对非西方社会提出的人权要求应当稍微温和一些，似乎同认为妇女可以部分怀孕那样几乎是一种谬论。从心理态度来说，这一类的人权活动者与以往时代的宗教运动参与者并无二致。他要求彻底皈依，绝无其他可言。此类活动者由于他们极端的狂热可造成相当大的损害。不幸的是，自从他们在西方社会占领了道德的高地之后，任何一国政府或传播媒介的代表都不

敢公开对他们提出挑战。

46. 然而，这些人权活动者的有些要求，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不可接受的。大部分亚洲社会如看到在它们的街头出现同性恋权利活动者将会十分震惊。而且，在大部分亚洲社会中，如果举行民众表决，绝大部分群众都会投票赞成死刑和对色情制作品实施审查制度。

47. 然而，亚洲人和西方人都是人。他们可就双方愿意在生活中遵循的最低限度文明行为标准达成共识。例如，应当禁止酷刑、奴役制、任意杀害、不允许半夜深更使人下落不明、不得开枪射杀无辜的示威者、不得未经认真审查实施监禁等。维护这些权利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原因，而且也是为了恪守公职的原因。任何社会，如与其出类拔萃之辈格格不入，在他们举行和平抗议时，象缅甸那样，开枪射杀，必然陷入不幸。大部分亚洲社会并不希望陷入缅甸今天的处境，一个与自己本身不和谐的国家。

48. 如果西方坚信它的人权和新闻自由制度可能对全球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最好的制度，那么让这些制度本身来证明自己的优点吧，如同在理念世界里，如果某个社会制度具有其优越性，那么它会依靠自己的翅膀腾飞。如果这个社会制度不行，那么它就不会飞跃。今天大部分亚洲人对这些制度已有足够的了解，可以自行做出选择。让他们平静地做出选择吧。

XX XX XX XX XX